

# 论诸葛亮在蜀地的影响

## ——以成都诸葛亮有关三国文化遗存为例<sup>1</sup>

高燕，梅铮铮

**【摘要】**：公元 221 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在成都创立蜀汉王朝。经千余年的沧桑巨变之后，当年王者雄风留在人们视野中的也只剩下一些三国文化遗存，还在默默承载着王朝的兴衰和人物的传奇。本文通过对一座祠庙、一座桥、一处水利工程、一块田地等与诸葛亮有关的特殊意义的三国文化遗存的诠释，分析诸葛亮文化在蜀地的传播与影响。

**【关键词】**：蜀地；诸葛亮；三国文化遗存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12-0014-7

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三国历史文化无疑是最为耀眼、最具有特色的。公元 207 年刘备三顾茅庐寻求贤能，诸葛亮献策时提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这是历史上最早将以成都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称为“天府”，自此之后，广袤的蜀地逐渐成为人们认可的“天府之国”。公元 221 年，刘备在益州创立了蜀汉王朝，经千余年的沧桑巨变之后，当年蜀汉王者雄风留在人们视野中的也只剩下一些三国文化遗存，还在默默承载着王朝的兴衰和人物的传奇。三国历史也是三国人物史，成都是蜀汉国都所在，三国遗迹以及与蜀汉人物有关的遗存众多。本文就成都与诸葛亮文化有关主要遗存为例，论诸葛亮在蜀地的影响。

### 一、三国圣地武侯祠

所谓武侯祠、孔明庙者，是纪念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专门祠庙也。据调查，目前中华大地包括台湾省在内具有一定规模的武侯祠有十六座，主要分布于诸葛亮曾活动过的地区，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成都武侯祠。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景耀六年（263 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sup>[1]</sup>此庙在今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为后主刘禅下诏建于蜀汉末期，是现存历史最早的武侯祠。虽然如此，就其影响而言，似乎远不如成都武侯祠。成都何时有武侯祠？正史不载。宋祝穆《方輿胜览》载：孔明庙“在府西北二里，今为乘烟观……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sup>[2]</sup>。李雄称王成都时在公元 304 年，孔明庙修建时间当在此之后，这是文献关于成都孔明庙的最早记载。即诸葛亮去世七十多年之后，当年蜀汉都城有了纪念性质的孔明庙。可以肯定，此庙为诸葛亮祭祀专祠，地点在少城内。据四川省博物院考古专家王家祐先生考证告之，此庙遗址范围约在今东城根街与商业街交汇一带。

当纪念诸葛亮的祠堂第二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时，已是四百多年之后的唐代。杜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按，杜甫于公元 759 年冬入蜀，作《蜀相》诗时间是第二年春，他所见的丞相祠就是今天武侯祠位置所在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武侯祠的位置由少城内变更到成都城南外，表面上看似边缘化，然实际上这正是诸葛亮文化在蜀地传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变化。首先，城南有蜀汉皇帝刘备的陵寝惠陵和汉昭烈庙，此处三国历史遗存自三国以降就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将诸葛亮专祀的武侯祠变迁至此，合乎君臣一体的封建礼制，也体现刘备与诸葛亮之间鱼水交融的深厚感情，自然是人心所向合乎大

<sup>1</sup>【作者简介】：高燕，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员；梅铮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馆员，四川成都 610041。

众心理需求的；其次，城南武侯祠提升了诸葛亮为国家大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文化传播平台，开启了诸葛亮对后世人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文化影响。今存自唐迄清不少文人墨客在武侯祠的题诗咏赞，就是后世对诸葛亮敬仰最好的证明。

在杜甫以前，我们尚未看到有人在成都武侯祠为诸葛亮题诗留记，而此之后却大量出现。李商隐、岑参等唐代名家的诗作，都从不同侧面表达对诸葛亮的敬意，尤其是唐代武元衡等在拜谒后留下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则是至今所见史料价值最大、艺术价值最高、赞誉诸葛亮最全面、分量最重的珍贵文物。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朝廷任命武元衡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到任后，选拔一些才学出众的才人担任幕僚，据《旧唐书·武元衡传》记载说他：“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抚蛮夷，约束明具，不辄生事。重慎端谨，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选。”<sup>[4]</sup>由是四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元和四年（809年）春，他率僚属二十七人到武侯祠拜谒诸葛亮。武元衡自觉效仿诸葛亮治蜀有功，让随行僚佐、节度掌书记裴度撰文以记其事。进士出身的裴度本身对诸葛亮极为仰慕和

钦佩，此次奉命撰文，竭尽华美之词，从“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四个方面对诸葛亮的功业进行全面评价。自明代以后，此碑因裴度之文用词精丽，柳公绰之书法端严浑厚以及诸葛亮治蜀功绩，均达到超绝的境界，故有“三绝碑”的美誉。令人奇怪的是，据考证研究得知，唐代武侯祠位于惠陵、汉昭烈庙两处古迹之间稍偏南处，是一处独立的祠堂。而唐朝时这片区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刘备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规模显然比不上后者。然不论是裴度的文章还是杜甫、李商隐等的诗歌，全都将视角集中在咏赞诸葛亮身上，这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千百年来，国民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标准在德高而非官大。刘备虽贵为蜀汉开国之君，但从立国到去世在蜀地统治时间仅仅两年多一点，而且还有一半时间不在成都，因此刘备在蜀人的心中难以留下深刻的影响。相反，诸葛亮在刘备去世之后，受托孤担当起国家重任。他对于刘备父子两代君主的辅佐及蜀汉朝廷可谓殚精竭虑，史书记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sup>[4]</sup>。“亮亦以禅未间于政，遂总内外”<sup>[5]</sup>，权倾一国，政治权利达到顶峰，但尽忠心毫无私念。这正是裴度谓之的“事君之节”。诸葛亮在未遇到刘备之前，隐居隆中“躬耕陇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sup>[6]</sup>。刘备“三顾茅庐”，坦诚以待，让诸葛亮感动不已。隆中一对，策划出创业方向；说服孙权，联吴抗曹；占领成都，完成既定目标，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报答刘备知遇之恩，这是裴度说的具有“开国之才”。身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为官廉洁，有《自表后主疏》表白其个人除朝廷配给之外，“不别治生”，即不仰仗权势为个人谋取私产。身为高官个人修养极高，不仅自己严格要求，同时对子女也从修身、养德方面进行传统的教育。《诫子书》立意高远，书信中诸葛亮以“静”和“躁”作为对比，讲明修身要静，克服“险躁”。后人从中精简提炼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志存高远”的经世名言，即使在今天也同样具有教育的现实意义。裴度说他“得立身之道”，大概就是指的这些吧。至于裴度在碑文中所谓“法加于人也，虽死徙而无怨”，应该是指的诸葛亮治蜀期间对于一些官吏处罚的“治人之术”，肯定他都是严格依法度而实施，没有夹杂半点个人恩怨。以至于被他处罚过的人闻之诸葛亮去世的消息，无不痛哭流涕，没有人怨恨。

自唐以后，武侯祠成为蜀地最重要的诸葛亮文化纪念地，这样的状况一直到明初才有了更为本质的变化。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朱椿就藩成都后，“首谒是庙，谓君臣宜为一体，乃位武侯于东，关、张于西，自为文祭之。盖至是武侯废祠，而乃以其碑庙中，观者不察，遂谓以武侯庙庙先主耳”<sup>[7]</sup>。朱椿到武侯祠拜谒诸葛亮，认为君臣分离各自祭祀的现状不符合封建礼制，于是在汉昭烈庙内塑关羽、张飞像于刘备像西面，塑诸葛亮像于刘备像东面。让诸葛亮跻身于刘备的殿堂上，朱椿本意是抬高他的地位，享受与皇帝同等的祭祀礼制。但客观上却废掉诸葛亮专祀的武侯祠，于是出现上文记载的内容。朱椿的做法显然不被蜀地百姓认同，不仅如此，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百姓反而认为是在武侯祠中加入了君王刘备的塑像，是以将塑有刘备、诸葛亮等像的汉昭烈庙称为“武侯祠”，可见诸葛亮在蜀地人们心中的影响超过了刘备。

明末清初，成都遭受战乱之苦、兵燹之灾，根据清代张德地《重修昭烈陵庙碑记》所记：“万物悉化焦土，即王公坟墓莫不掘毁无遗。独昭烈一塚，历久常存，巍然如故。”<sup>[8]</sup>碑记向我们描述当时的惨状，惠陵尚存，但祠庙严重毁坏，只剩下残垣断壁。于是一些对诸葛亮怀有深厚感情的官员在川湖总督蔡毓荣倡导下，四川按察使宋可发、抚蜀大中丞罗森、四川督学使张含辉、四川布政使金僩等共同捐资恢复重建武侯祠。重建工程于康熙十年（1671年）九月开工，次年五月完工。恢复重建的祠庙

“奉昭烈正位于前殿，而左庑则拊以伏魔帝、北地王；右庑则拊以张桓侯、傅将军。堂帘以肃，如朝廷礼。特建后殿，奉武侯于中，子若孙昭穆一堂，如家庭礼。于是一代明良，与一代忠义，过庙抵谒，千秋共仰。”<sup>[9]</sup>这样的建筑格局，一改南北朝以来君臣祠庙自成体系的分别祭祀旧貌，又不同于明初诸葛亮拊祀于昭烈庙中的陪衬地位。虽然两座大殿前后整齐排列于一条中轴线上。前殿祀君王刘备，以蜀汉功臣陪祀东西两庑，后殿祭丞相诸葛亮及儿孙。这样排列既没有违反封建君尊臣卑的礼制，又极大迎合诸葛亮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成为一座中国独一无二的君臣合祀的祠庙。竣工后，所有捐资参与此事的官员纷纷撰写刻碑记录其事。川湖总督蔡毓荣《重建诸葛忠武侯祠碑记》、四川按察使宋可发《重建忠武侯祠碑记》，至今仍矗立在武侯祠大门内侧。另据馆藏大清道光九年修撰的《昭烈忠武侯祠志》记载，当时刻立还有四川督学使张含辉的《重建诸葛忠武侯祠碑记》和四川布政使金儒《重建诸葛忠武侯祠堂记》。从这些大清官员所刻立的碑名得知，所有人几乎回避了此处原为刘备陵园的历史事实，众口一词称祠庙为诸葛忠武侯祠，俗称武侯祠。明代以前所说武侯祠指的就是诸葛亮专祀的祠庙，明代以后百姓口中的武侯祠，其实是指刘备的惠陵、以及有诸葛亮像在内的汉昭烈庙在内的历史遗存。到清代因建筑的重建和祭祀对象排列格局的改变，成都城南这处蜀汉文化遗存的主角逐渐由刘备演变成诸葛亮为主的三国文化圣地。这个变化过程并不是人们对刘备的不恭，而是人们认为与诸葛亮相比，刘备给人的印象是一代明君。虽然他性格“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sup>[10]</sup>。甚至他还说过“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sup>[11]</sup>这样令人十分感动的的话，但于民众眼中毕竟是局局在上的九五之尊。而诸葛亮则不一‘样，从二十七岁出山辅佐到五十四岁星落五丈原的人生，特别是在施展政治抱负的二十七年中，有十余年时间正是在蜀中度过，也是他人生最作为、最精彩的时期，几乎完整的践行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誓言，这对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十分难能可贵。民国年间，有人作诗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诗曰：“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

## 二、东行始于万里桥

成都城南锦江南岸有万里桥，其兴建的历史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秦蜀郡太守李冰时期。为治理成都水患，李冰在郫江和流江之上修建的七座桥，万里桥为七桥之一，横架在流江上（流江后称锦江），然真正让万里桥出名是与诸葛亮有联系的三国时期。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剑南道中》：“万里桥架大江水，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故名。”宋代《太平寰宇记》亦有类似记载，但宋代《方輿胜览》卷五十一《成都府路》记载：“万里桥在成都县之东，按《寰宇记》：昔诸葛亮送费祎聘吴，至此曰：‘万里之路始于此矣！’又刘光祖《万里桥记》云：‘孔明于此送吴使张温，曰：此水下至扬州万里。’”<sup>[12]</sup>上述唐、宋文献分别表述了万里桥之得名的由来，或为诸葛亮说，或为费祎说，还有东吴张温说，但在民间统统将万里桥得名与诸葛亮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其深层的含义是在说明诸葛亮治蜀操劳辛苦，继续“联吴抗曹”的既定方针，为蜀、吴两国之间联盟做出艰辛的努力。据根据史书记载，蜀、吴之间自夷陵之战后再没有发生战争，尤其在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主政期间，蜀汉王朝坚决贯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sup>[13]</sup>的方针，两国之间往来频繁。记载于史书的蜀汉费祎、陈震、邓芝、张裔以及东吴张温等，都是往来两国之间传递友好信息的使者。《三国志·费祎传》中记载：诸葛亮南征回到成都，以费祎为“昭信校尉”东去联合孙吴。可见费祎出使是有历史依据的，只不过后人将其描述得过于具体，甚至说桥之得名是因诸葛亮说过“万里之路始于此”这样含义深刻的话，这大概是人们表现诸葛亮操劳蜀汉命运的一种方式吧。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底部，由于四周高山所阻自古交通不便。从成都往北主要是金牛道通往关中平原；往西南则经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经雅安、芦山、西昌、到云南再通往南亚地区；向东则由水路经彭山、乐山、宜宾汇入长江一路往东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诸葛亮在平定南中的叛乱之后，为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既定目标，不断派出官员出使东吴，希望重修旧好，共同对付曹魏，当时往东之行最便利的就只有水路，出发点就是在锦江沿江码头，万里桥当是最便捷的重要码头之一。杜诗中“门泊东吴万里船，”则是杜甫所见当时从长江中下游驶来的船只停泊锦江的真实记录。可见诸葛亮送蜀汉官员顺流东下是经常发生的历史事实，至于唐、宋文献所记之万里桥送别之言，并不见于史载。其实早在秦代李冰治蜀期间，此桥就名万里桥。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中记载：“州治太城，郡治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南渡流江日万里桥。”<sup>[14]</sup>流江即锦江，1988年对万里桥进行第三次重要维修时，考古工作者在桥基多处考古调查时，发现汉砖和基石上年代不详的木桩孔洞，还有大量清代的木质桥基，证明万里桥两千多年间位置是没有变动的。只不过今人所见万里桥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

的桥梁，古老的万里桥早已在 1995 年被拆除。老桥的建筑构件被搬运至锦江上游的浣花溪，人们在此重建“万里桥”。但已很少有人知晓此桥所承载多位蜀汉官员践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厚重历史使命了，真是殊为可惜。

### 三、都江堰与九里堤

人们常说，治理蜀地必先治水。对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技能落后的古代来说，这不失为经验之谈，是以三国时期，诸葛亮治蜀，在强调蜀锦生产的重要性的同时，特别重视蜀汉农业经济发展。他施行“务农殖谷”方针，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注重对古代水利工程的维护和管理。当年秦蜀郡太守李冰治蜀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开凿都江堰，自此后，以成都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sup>[15]</sup>的富庶之地。诸葛亮早在襄阳时就已经将益州这些丰富的资源了然于心，其《隆中对》就给刘备提出占据益州作为根据地的策略。当这一战略决策实现后，治理蜀地自然不会忽视水利对国家的基础建设作用，是诸葛亮首先在都江堰设立世界上水利专管官员“堰官”。据《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一》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sup>[16]</sup>千百年来都江堰泽被蜀地百姓，成为世界上至今仍发挥其功能的水利设施，人们在赞扬李冰功劳的同时，也不忘诸葛亮精心呵护和重视的功劳。至今的都江堰堰工大道上，诸葛亮的塑像赫然屹立在前，民间流传这样说法：开堰之功在李冰，护堰之功是诸葛。可见但凡在历史上为老百姓做过善事者，历史不会忘记，老百姓也不会忘记，因为功绩在人心。

据《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坝。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峨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sup>[17]</sup>史料说明，除了都江堰李冰还有另一项水利工程是开通郫江、捡江，扬雄《蜀都赋》中形容为“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从客观上反映出两江的开通为蜀都繁荣建设提供了便利。两江，即郫江（外江）和捡江（内江）。成都西北郊府河西岸九里堤，就是古代为防止郫江水泛滥而修建的堤坝。至于九里堤的得名，明朝天启年《成都府志·山川》记载说为诸葛亮所筑：“九里堤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超。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sup>[18]</sup>故人们又称九里堤为“诸葛堤”。《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一《舆地志》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十里，其地洼下，水势易超，汉诸葛孔明筑堤九里，捍之。宋乾德中太守刘熙古重修，又号刘公堤。”<sup>[19]</sup>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四川通志》《大统一统志》等文献。总之，这些文字记载都将九里堤的兴建者，指向蜀汉丞相诸葛亮。但我们在研究其历史沿革详查史料中发现，九里堤的建造似乎难以认定为诸葛亮所为，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龙坝池”条注释为：“《水经注》作‘龙堤池’。堤与坝同义，捍水之土埂也。考其地，即今城西北之‘九里堤’……近人于堤下掘得《蜀丞相亮护堤谕碑》，确是汉刻。证明其地原为池泽。有堤捍水，古曰‘龙坝’也。”<sup>[20]</sup>按任乃强先生说法，九里堤的位置在汉代就已修建防水堤，名为龙坝池，甚至还有蜀汉时代诸葛亮碑刻为证。任老所言《蜀丞相亮护堤谕碑》他应该亲自见过，但不知今在何地。该碑碑文内容为何？任老没有说，我们也无从考证该碑是不是诸葛亮刻立。但这是否说明诸葛亮在治理蜀地水患时，曾修筑堤坝后刻碑警示？201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都通史》卷二“秦汉三国（蜀汉）时期”中提到九里堤时，说到民国年间有人在九里堤下掘得《蜀丞相亮护堤令碑》，碑文内容是：“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浚，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制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sup>[21]</sup>作者没有指明碑今存何地，从提供的拓片看，书体为隶书，似乎证明确为蜀汉诸葛亮刻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通碑并非任老所说碑，因为任老所言碑与此处提及的碑名是不同的。以任老的学识断定为汉代碑刻应无异议，而所谓《蜀丞相亮护堤令碑》虽为汉隶，可存在明显的漏洞，因为任老注释《华阳国志》词条明确标明当时修筑的叫“龙坝池”而非“九里堤”，证明后者实系伪刻汉碑无疑。此外，伪碑最明显的错误在于留下刻碑时间为“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而历史上章武三年的年号只到当年四月先主刘备去世，五月刘禅即位就改元为“建兴元年”了。

根据上面文献记载和任老所注，以及我们从参与此地考古调查的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同志了解到，所谓“九里堤”是明代才出现的称呼，汉代于今九里堤的地方建龙坝池以防止郫江水。晚唐高骈扩展城垣时，又在龙坝池基础上筑糜枣堰节制江水。宋代，成都知府刘熙古因郫江水冲击，原建堤坝在冲击之下发生溃堤，于是大修堤坝，功劳巨大，后人为纪念刘知府，于是称堤为刘公堤，并建立刘公祠。到明、清时期，一些地方文献如明正德《四川志》、嘉靖《四川总志》、天启《成都府志》、以及大清康熙年《成都府志·山川》、雍正《四川通志·津梁》等，都记载为诸葛亮筑堤堰护水，并将刘公祠改建为诸葛庙，是以九里堤也叫诸葛堤了。由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九里堤的修筑历史大约在两千年左右，只是名称历代有所变化。它是汉代

以来官吏倡导，百姓参与修建的为防止江水侵毁成都城池的堤坝。除了防止水患，还兼具承接上游用于建筑所需大竹、梓、柏等木材转运码头的功能，可视为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在下游利用延伸。在经历汉、三国、唐、宋、明、清历代修缮之后，城市得到保护和发展，百姓大众得到实惠。尤其是蜀汉时期诸葛亮治蜀功绩显赫，不论他是否参与过九里堤维修，他是一定不会忽视筑堤防洪，所以人们都愿意将其功劳归功于他，所以蜀地百姓又将九里堤称诸葛堤，这是人们的意愿所致。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因河流变迁九里堤早已失去防护功能，但九里堤、诸葛堤这个称呼依然流传下来，堤旁的诸葛庙就是最好的证明。

## 四、葛陌论廉洁

成都双流区星空路南五段东升街道所辖范围最初称“葛陌村”，现在那里的管理机构仍叫“葛陌社区居委会”。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剑南道》载：“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十八里，今谓之‘葛陌’。孔明表云：‘薄田十五顷，桑八百株’，即此地也。”所谓“孔明表”，即诸葛亮《自表后主疏》。这份奏疏是他就个人家庭经济状况、财产来源等，向后主刘禅逐一进行的说明，表白自己忠勤国事绝无半点贪念和以权谋私的行为。因其表文极为真诚感人，兹过录如后：“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sup>[22]</sup>这是身居丞相高位的诸葛亮向朝廷公开自己私产的一份奏疏，字里行间都在表述自己家庭成员衣食已经富余，在朝廷身居高位，没有另外的财物征调收取；个人衣物食品，都是朝廷供给，没有经营产业以谋取私利。关键是在这奏疏之后，史家的记载是“及卒，如其所言”<sup>[23]</sup>。也就是说诸葛亮是如实汇报没有半点虚言，仅仅六个字抵得上万言的评语分量，这在汉末三国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东汉桓、灵之后，朝廷陷入深深的腐败，汉灵帝公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sup>[24]</sup>。地方豪族则极尽生活之奢华，“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sup>[25]</sup>。汉代益州，因都江堰惠泽蜀地带来极大的便利，百姓不大劳作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至于为官者更是贪图享乐极尽奢侈。史书上说：“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sup>[26]</sup>不少在此地为官者无不以积累财富为要，廉洁奉公者当凤毛麟角。刘备称帝益州以诸葛亮为相，面对刘璋管理下的益州“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sup>[27]</sup>的混乱状况，诸葛亮采取依法治国的方针，与法正、李严、刘巴、伊籍共同制定蜀汉法律《蜀科》。在法律的制约下，蜀汉朝廷官员勤勉努力，朝廷上下齐心，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诸葛亮在其中当然是严于律己的楷模，不仅有《自表后主疏》的表白，还有约束后辈的《诫子书》《又诫子书》和《诫外甥书》，以及对对自己的身后事包括丧事从俭等的遗嘱，所有这一切都让诸葛亮成为历代贤相的楷模。至于今天再到“葛陌”，虽然早已由一片田畴变得面目全非的葛陌社区，但人们透过社区层层叠叠的楼房还是能依稀仿佛看到诸葛亮的清廉形象。

## 四、结语

通过上述成都地区与诸葛亮有关的三国文化遗存可看出：一座城市因为有了文化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而文化则是由千百年来生活这里的历史人物所创造的。人们并不以这些历史人物地位的高低，年龄的大小来决定他们在心目中和社会地位、主要看的是他为官一朝能否使是否国家稳定、百姓安康，对广大民众做出过多少有益的事情。史家评论蜀地在诸葛亮治理之下，“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sup>[28]</sup>。这对于处于动乱时期的三国时代，正是蜀地人民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当然，成都地区与诸葛亮相关的遗存还有锦官城、诸葛井、临邛火井、牧马山等等，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里我们只是通过一座祠庙、一座桥、一处水利工程、一块田地，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三国文化遗存，很好的诠释诸葛亮文化在蜀地的传播与影响，这是诸葛亮在天府之地为百姓树立起的一座座纪念碑，诸葛亮因此成为天府历史文化名人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

[1][4][5][6][10][11][13][22][23][26][27][28] 方北辰. 三国志全本今译注[M].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1824, 1814, 1773, 1816, 1752, 1727-1728, 1807, 1823, 1823, 1940, 1813, 1836.

[2][12] 祝穆. 方輿胜览(第五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6, 13.

[3] 刘陶. 旧唐书(第十三册)[M]. 中华书局, 1975. 4160.

[7][8][9] 潘时彤. 昭烈忠武陵庙志校注[M]. 四川科学出版社, 2012. 274, 278, 290.

[14][15][17][20] 常璩著.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52, 133, 132-133, 131.

[16] 王国维. 水经注校[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039.

[18] 冯任等. 天启成都府志(上)[M].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7. 68.

[19] 李玉宣等.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M]. 巴蜀书社, 1992. 45.

[21] 《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 成都通史(卷二)[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 91.

[24][25] 范曄. 后汉书[M]. 中华书局, 1987. 1731, 1648.